



中国科学院院史丛书

科苑前尘往事

薛攀皋 / 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院史丛书

科苑前尘往事

薛攀皋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苑前尘往事. 薛攀皋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7
(中国科学院院史丛书)

ISBN 978-7-03-031321-8

I. ①科… II. ①薛… III. ①科学史学—研究 IV. ①N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3115 号

丛书策划: 胡升华 侯俊琳

责任编辑: 张 凡 程 凤 / 责任校对: 刘亚琦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 × 1000)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0 1/2

印数: 1—5 000 字数: 400 000

定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1951 年秋，我大学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在院部从事生物学科科研组织管理工作，1991 年年底，我在返聘期满后离开院部。这 40 年间，我经历了中国科学院奠基创业、向科学进军的火车头、“文化大革命”浩劫、治理动乱创伤初步探索改革四个时期。

我在职期间，除了完成组织上指定的编写任务外，没有自由选题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这本文集收入文章 28 篇、访谈录四篇，其中多数是我退休后写成的。它们大致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科学院院史的若干片段

开头四篇文章说的是中国科学院早期的性质、地位、职责和作用。《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统一领导管理体制建立的历史回顾》和《中国科学院第一次定位》，回顾 1949 年 9 月作为学术研究机关的科学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立法为组成政务院的政府部门，主管国家科学事业。它虽然是政府部门，但实际上难以行使政府职能，处境极其尴尬。1956 年，《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定位》，成为国家向科学进军的火车头，并且由此引发争端，险遭肢解。《中国科学院与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反映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第一部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编制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首次民主选举学部委员（院士）》与《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回忆》两篇文章，回顾 1979 ~ 1981 年，中国科学院拨乱反正，为恢复与重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强行撤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 and 学部委员制度，以及第一次民主增选学部委员所作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个科学院没有传承关系》一文，是为了澄清事实，恢复中国科学院院史原来面貌。它指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同中国科学院没有传承关系，不是组建中国科学院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科技队伍的建设亟待加强》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学事业三十五年》是我与季楚卿同志合作撰写的。前者，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指出队伍的优势，面临的挑战，存在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建议。后者，综述 1949 ~ 1984 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学事业发展走过曲折道路，以及生物学工作者在国家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调查研究，为国家

工农医国防建设服务，以及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二、中国科学院或有关部门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

这方面有自然科学史工作者根据我的口述，整理而成的四篇访谈录。《遗传学与百家争鸣》一文回溯 1956 年 8 月，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在青岛联合召开遗传学座谈会的背景；并分析在“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和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后，到改革开放前，摩尔根遗传学在我国仍多次遭受批判的原因。《回顾“十二年科学规划”》介绍 1956 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持编制“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的过程，以及规划的执行情况。《追忆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在科学与政治之间：1964 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分别介绍 1962 年、1964 年两次重要的科学会议的情况。前者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持召开，时值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期，会议对“大跃进”时困扰科学领域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到会，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后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科学工作者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会议被赋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等政治内涵。

三、中国科学院和国内若干生物学事件

1. 学术问题被上升为政治问题

《“乐天字事件”与“胡先骕事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救了植物学家胡先骕》等文，回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大背景下，教条主义照搬苏联错误做法，给自然科学的某些学派贴上政治标签，以行政手段支持米丘林学派，禁止摩尔根学派，导致经典遗传学在我国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全部停止。胡先骕教授批评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被扣上“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名。他的《植物分类学简编》未售出的全部被销毁。中国生物学家在一段时间里，再也不敢公开批评苏联李森科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小议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则是对陆定一同志晚年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正确对待遗传学争论问题的质疑。《高端权力介入与中国心理学的沉浮》列举事实，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兴衰荣辱乃至遭受灭顶之灾都与高官政要能否理性面对与处理心理学界的问题有关。没有从遗传学被取消的恶果中吸取教训，动辄发动对所谓“资产阶级心理学”、“伪科学”的批判，使中国心理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步遗传学的后尘，遭到灭顶之灾。

1960 年 2 月，上海一位中学生物学教师写文章，上纲上线批判著名生物学家

朱洗及其巨著《生物的进化》。他攻击朱洗用“无政府主义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并诬蔑朱洗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上海一个克鲁泡特金小集团的为首分子。在“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时，一个小人物批判著名科学家绝非小事。当有关部门请示如何处理这篇批判文章时，聂荣臻在了解《生物的进化》瑕不掩瑜，是一本好书后指出，不要全盘否定该书，更不要把朱洗一棍子打死。他责成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负责同志亲自与朱洗谈话，鼓励他在该书再版时对个别内容加以修改；同时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同志约见那位中学教师，说明不发表他批判朱洗文章的理由。朱洗与那位中学教师深受教育。这是《聂荣臻保护生物学家朱洗“过关”》一文的故事。

2. “大跃进”、“瞎指挥”、“浮夸风”

《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回顾了一段历史过程：我国不能正确对待国外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发动全民消灭麻雀运动；少数科学家冒天下之大不韪，执著地为麻雀翻案；最后，“四害”中的麻雀被改为臭虫，麻雀家族终于躲过了满门抄斩的大劫。

《对土专家进中国科学院当研究员的反思》，回顾1958年3~5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思想被反复阐述，并一再号召学问少的人起来打倒学问多的人，剥夺高级知识分子，即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翘尾巴的资本。据此，广东省治白蚁的土专家李始美当上了中国科学院的专职副研究员，成为工农兵进国家科研机关“掺沙子”的先例。遗憾的是李始美在优越的环境里，拿研究所最高的工资，并没有什么作为。

《为什么说真话那么难》、《“粮食多了怎么办？”》和《回眸粮食严重短缺年代的代食品研究》，讲述的是中国科学院许多研究技术人员在“瞎指挥”、“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年代，被卷入粮食问题中的三个典型事件。第一件是1958年7月初，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北京市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共同组织各地农民高产能手与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打擂台，竞赛种单季亩产几万斤的水稻、小麦“卫星田”。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在北京的八个研究单位的许多研究人员，被迫投入了明知其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的实验研究。第二件，同年8月初，毛泽东对亩产万斤以上粮食深信不疑，高兴地提出：应该考虑粮食生产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六个研究所（化学、生物学）因此接下了新的政治任务：研究粮食综合利用问题。第三件，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过不多久，中国人民从粮食多了吃不完的美妙神话中，跌落到粮食严重紧缺、瓜菜代、浮肿病、饿死人的残酷现实中。中国科学院近30个研究所科研目标大转向，研究怎么吃那些原来不吃的东西，并研究小球藻、叶蛋白、人造肉等代食品。



中国人民已经在1958年“大跃进”的第一个回合中吃够了苦头，但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大跃进”狂飙再起。《1960年的全民超声波化运动》被诟为“全党办科学”、“全民办科学”的标志，在全国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人人试验，处处试验。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所有研究机构，不管需要不需要超声波技术，一律停止原有的研究工作，突击40天，开展“以超声波化为纲的五化、三无、一创运动”。无视科学自身发展规律，以群众运动代替细致的研究工作，劳民伤财的全民超声波化运动以失败告终。

3. 科学研究中不端行为

1963年11月30日，朝鲜平壤医科大学教授金凤汉在其研究所研究成果报告会上声称，他发现了经络系统实体。1963年12月14日，我国《人民日报》没有听取科学家意见，就以两个整版和一个半版的版面，全文发表金凤汉的研究报告《关于经络系统》，并配发评论文章，认为发现经络系统实体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1964年1月中旬，有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参加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金凤汉经络研究所，回国后进行重复实验，揭穿了金凤汉弄虚作假的事实。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员被告诫不可无所顾忌地谈论访朝的观感；不准将重复实验结果公之于众，不得向“局外人”述说事实真相。金凤汉被其同胞揭发后一死了之。而我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至死都奉命“保持沉默”。其实金凤汉的《关于经络系统》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我国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在第一时间都表示其中有真有假，但真的不多（参见《“经络系统”座谈会纪要》）。

除涉及以上三类事件外，还有下面两篇文章。

近几年，国内有些报纸、刊物、研究诺贝尔奖的专著及中央电视台节目，把我国参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的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原因，归咎于国内有关主管部门无视该奖只能推荐一至三名候选人的规定，坚持并违规推荐四人的候选名单。一时以讹传讹，闹得沸沸扬扬。对此，《关于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果的历史真相》一文列举事实，予以澄清。

《有感于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迁武汉五十周年》，介绍了该所的前身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所长与全所职工，于蒋介石兵败前夕拒绝迁往台湾；1954年，水生生物研究所为国家建设需要全所从上海、无锡两地迁往武汉的过程。拒绝迁台，西迁武汉都是好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弥天大祸。该文还介绍了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武汉创业，经几代人的努力不断推陈出新，从一个以分类学、形态学为主要基础的研究机构，发展成为水生生物学领域中重要的综合性研究基地。

科学研究允许失败，但不能容忍欺骗。科研队伍中有少数人，为追求个人私利，无视科学道德，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自吹自擂，在科学工作轨道之外寻求支持力量。《“刘亚光事件”和“牛满江事件”》一文，讲的是年轻研究人员刘亚

光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科学界折腾了16年；美籍华人、美国坦普尔大学教授牛满江在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折腾30多年的梗概。

四、我在中国科学院的经历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追忆在中国科学院宁夏和湖北两所“五·七学校”的生活》，回顾了我在这两所“学校”的近四年的劳动改造经历，披露了它们是为惩罚干部和知识分子而设立的本质。

《不曾想走的路：我与中国科学院》，记下1951~1991年我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40年的历程。

以上是收入本书文章的内容简介。

我要说明：在“大跃进”特定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领域中发生过一些在错误指导思想下发生的错误事件，如《向大自然进军 向地球开战》一文所注，我虽然不是事件的策划者、主事人，但是我用同样的思想感情去歌颂它或鞭挞人，这些也就成为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该文收进文集时，不作改动，保留原貌。

我还要说明：有些文章当初在报刊发表时，对事件的主人出于“为尊者讳，为贤者讳”，隐去其姓名。鉴于记述历史事件必须求真存实，秉笔直书。为此，在收入文集时如实补入事件中心人物的名字，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一生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贡献的否定。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不论是出于科研管理工作者的良知，还是出于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我都必须用真心来写这些文章，说真话，讲实事。但是，即使是我亲历或者亲自办理过的事件，我也并不处于决策的位置。因此，有些文章可能有不准确之处。对此，我衷心欢迎批评指正。

每一代人都有为后人存史的文化使命。我不是专业的自然科学史工作者，这本文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史著作，我不敢奢望它能对后人产生鉴往知来的作用。我稍感安慰的是，在经历三次冠状动脉手术、脑供血不足日趋严重、精力日衰、健康每况愈下的情况下，我强自挣扎，为中国科学院院史和生物学史做了点工作，留下了一些零星资料。虽然这些工作微不足道，却也尽了我的一份心。

我要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史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扬宗和张藜同志，副研究员熊卫民同志，他们为文集的内容与编排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此外，我还要向关心这本文集的出版及参与操作的同志，以及我家人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薛攀皋

2011年2月

目 录

前言

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统一领导管理体制建立的历史回顾	1
中国科学院第一次定位	
——政务院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	10
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定位	
——向科学进军的“火车头”	20
中国科学院与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	30
中国科学院首次民主选举学部委员（院士）	40
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回忆	45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个科学院没有传承关系	63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科技队伍的建设亟待加强	70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事业三十五年	78
遗传学与百家争鸣	
——薛攀皋先生访谈录	101
回顾“十二年科学规划”	
——薛攀皋先生访谈录	105
追忆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薛攀皋先生访谈录	121
在科学与政治之间：1964 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	
——薛攀皋先生访谈录	133
“乐天宇事件”与“胡先骕事件”	145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救了植物学家胡先骕	161
小议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	170
对土专家进中国科学院当研究员的反思	173
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180

为什么说真话那么难

——从科学家与农民竞赛放“卫星”谈起·····	190
向大自然进军 向地球开战	
——生物学部、地学部联合举行京区单位“跃进”大会·····	201
“粮食多了怎么办?” ·····	206
回眸粮食严重短缺年代的代食品研究 ·····	211
1960 年的全民超声波化运动 ·····	220
聂荣臻保护生物学家朱洗“过关” ·····	227
“金凤汉事件” ·····	233
“经络系统”座谈会纪要 ·····	241
高端权力介入与中国心理学的沉浮 ·····	244
有感于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迁武汉五十周年 ·····	255
关于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果的历史真相 ·····	262
“刘亚光事件”和“牛满江事件” ·····	268
追忆在中国科学院宁夏和湖北两所“五·七学校”的生活·····	281
不曾想走的路：我与中国科学院 ·····	293
未收录的部分文章资料存目 ·····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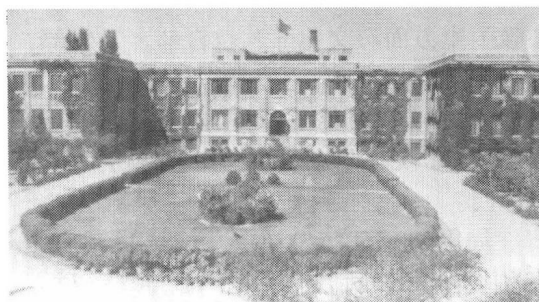
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统一领导管理体制建立的历史回顾*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从中央到地方都已基本建成了统一领导管理体系。而科学技术事业的中央一级的统一领导管理机构，直到1958年年底才成立。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有了统一的领导，是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的。它的成立，走过了九年多的摸索过程，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一）中国科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主管国家科学事业行政事宜的政府职能部门（1949年11月~1954年9月）

中国科学院作为学术研究机关，成为政府机构，在世界各国科学院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建科学院，并责成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负责其事。来自解放区的化学家恽子强，与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心理学家丁瓚，协助陆定一工作。原北平研究院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原中央研究院植物生理学工作者黄宗甄也参与其事。



1950~1966年的中国科学院院部（文津街3号）

关于科学院的性质与任务，筹建初期的构想是学术研究机构。1949年8月

* 本文原载《薛攀皋文集》（内部交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编印，2008年1月，第1-9页。



22日，周恩来在为新政协（同年9月17日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第二稿）中是这样写的：“国家应设立科学院罗致专门学者，做理论及学术的研究，并与各种建设部门的具体研究合作，以促进科学的发展。”^①同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先期到达北平的新政协筹备会各界代表的会议上，作新政协共同纲领草案初稿的报告。初稿的第43条是：“设立科学院为国家最高的学术机关。”^②

但是，科学界人士不满足于即将成立的科学院，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那样，仅仅是纯学术机关，而是强烈希望科学院能够计划、组织、领导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1949年9月11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的常委们，在提交给新政协的提案中写道：“设立国家科学院，统筹及领导全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使生产与科学、教育密切配合。”9月中旬，丁瓚和钱三强在广泛听取科学界人士的意见后，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的草案》（简称《草案》）。《草案》由恽子强看后送给陆定一。《草案》提出：“人民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在于有计划地利用近代科学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以提高我国的科学研究水平。”科学院不但要领导本院的工作，还要计划全国科学有关工作，“此等工作均历年来全国科学界所热望于政府能做统盘筹划统一设施者……真正能对全国科学研究起计划领导作用者。”^③

科学界的热切希望，终于为决策者所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1~30日，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举行。9月27日，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政务院下设30个部、会、院、署、行，其中文教卫生方面有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出版总署和新闻总署。还规定政务院的这些部、会、院、署、行，“主持各该部门的国家行政事宜”（第18条），并“在自己的权限内，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第19条）。据此，科学院被国家定位为组成政务院的，主管国家科学事业行政事宜的政府职能部门。

1951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国科学院负有“计划与指导全国科学事业”的任务。^④

① 周恩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194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1。

②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II。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84，1285。

③ 丁瓚，钱三强：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1994：24-26。

④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1951年3月5日）。科学通报，1951，（4）：3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它肩负双重任务，作为学术研究机构，正处于奠基创业的起步之时，需要接收旧中国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所属的研究机构以及其他有关的近 30 个研究所，并以此为基础予以调整充实，组成 20 个中国科学院直属的研究所（台、馆）和筹备处，确定其方向任务，使它们能尽快开展研究工作，培养新生力量。就这些而言，任务也不轻松。而它还要作为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在毫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计划、组织、领导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其艰巨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中国科学院在面向全国的工作方面，作了努力探索。例如，进行全国科学人才和试验研究机构状况调查；争取并协助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回国服务；支持国内大学或个人的科学研究工作，予以适当经费资助；扶助有关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召开一系列专题学术会议或工作会议，就某一科学领域或生产建设中急需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进行讨论，促进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与产业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分工合作；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等。

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国科学院认为要实现计划、组织、领导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依靠和发挥国内科学家的群体作用。为此，中国科学院曾先后提出设立“科学工作委员会”、“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以及参照李四光在地质矿产方面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经验，设立由政务院各有关部门的领导、管理干部和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三者结合组成的“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但都因被认为条件不够成熟，未能通过，或者没有下文。^①

中国科学院在计划与指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探索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其中不少是自己难以解决的。例如，难以理顺与政务院其他各政府部门的关系，难以打破科研工作条块分割的局面；中国科学院高层党政领导力量薄弱，组织形式与政府职能不相适应；提出的设想得不到支持和试行的机会，等等。为此，中国科学院不间断地呼吁国家另设专职的、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机构。但是，国家都没有及时对此做出回应。

直到 1954 年 9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国科学院才回到它本来应该在的位置上，是学术研究机关、事业单位，不再是政府机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暂时留下没有主管科学事业政府职能部门的空白（1954 年 9 月 ~ 1956 年 3 月）

1954 年 9 月 20 ~ 2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分别通过了

^① 薛攀皋．科学院为什么不能充分行使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府职能．院史资料与研究，2001，（1）：19-36.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11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设立、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的第六条是：“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属中国科学院今后不再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仍受国务院的指导。”^①

在中国科学院不再是国家政府机构之后，理应有另一个部或委员会取代中国科学院，来行使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对此却暂时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空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设立35个部或委员会，其中，文教卫生体育方面有文化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务院设立八个办公室，协助总理掌管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工作，其中，第二（文教）办公室掌管文化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局的工作。主管科学事业的部或委都付阙如。

这种情况的出现，反映了国家在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管理体制问题上，考虑还不成熟，举棋不定。

（三）临时机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常设机构国家技术委员会并立（1956年3月~1956年12月）

中国科学院这时虽然不再是组成国务院的政府机构，但它依然认为国家应该有一个常设的政府部门，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4年10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B. A. 柯夫达奉派来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他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考察后，于1955年1月，提出了《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柯夫达首先建议要尽快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事业十五年远景规划，阐述其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如果中国科学发展速度不能适应国家建设任务的要求，将会带来严重的麻烦与困难^②。

1955年4月7日，郭沫若院长在给周恩来总理和分管科学的陈毅副总理《关于贯彻院长顾问柯夫达建议向国务院的报告》中，希望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出面组织“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规划委员会”，主持编制科学远景规划工作，并建议在国家计委下设立“科学研究工作局”，作为经常管理科学计划的专业机构。^③

① 国务院关于设立、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151-153。

② 柯夫达：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1956：55-63。

③ 郭沫若：关于贯彻院长顾问柯夫达建议向国务院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1956：64-66。



但是，国家计委并没有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李富春说，过去国务院多次指示都是要求国家计委把科学研究工作统一抓起来，中国科学院也多次提出请国家计委统一领导全国科学计划工作。由于我们组织领导全国科学工作没有找到一个妥善办法，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搞科学技术规划，靠国家计委这样的行政部门是很难办好的，必须组织全国科学家共同进行，而国家计委则难以完成任务。^①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郑重宣布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充分肯定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他还宣布：“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3个月内，制定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12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最初由李富春负责，后来改由分管科学的副总理陈毅主持。1956年3月14日，以陈毅为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为副主任，并由有关部门负责人、科学家共35人组成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它是一个领导制订该规划工作的临时机构。该委员会所领导的十人规划小组已先期于1955年12月开始工作。

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之后，5月12日，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定》，国家技术委员会成立。它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职能部门，根据中央发展技术的方针政策，主管我国工业、交通部门的技术工作，并着重研究综合性的技术政策，组织协调跨部门的技术工作。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是黄敬，副主任有韩光、刘西尧、张有萱等。^②两个委员会并立，出现了科学与技术分家管理的局面。

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下，“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1956年3月起，包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院士）在内的全国各行各业的600多位科学家，集中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经过半年努力，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并指出了各门科学的发展方向，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画出了轮廓，并做出了初步安排。编写出的科学规划文件，包括一个《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和四个附件，即《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

① 武衡. 科技战线五十年.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192，196.

② 陈毅，李富春，聂荣臻. 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6月29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九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428-434.



学学科规划说明书》、《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和《1956年紧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计划要点》，共600余万字。这是规划工作的主要收获，也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创举。

同年8月下旬，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对规划工作进行总结性讨论，包括该规划纲要草案中几个有争论的问题，形成了后来送中共中央批准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关于“十二年科学规划”编制完成后，对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是否保留的问题，出席会议的科学家和大多数有关单位负责干部，都主张保留科学规划委员会，使之成为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以协调和监督规划任务的落实与执行；只有少数党员负责干部，要解散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认为有了它反而不好工作。对此，陈毅动情地说：我们对待科学家不能采取“招之即来，挥之则去”的态度，这不是我们党的作风！我就是要保留这个委员会，哪怕一年开一次会也好么！陈毅对于有些党员干部态度傲慢，自以为是，不尊重科学家，不能与科学家合作共事，非常气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①

1956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让陈毅主持外交部工作；同年10月，聂荣臻受命统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10月28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召开了一次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科学规划十人小组常务组员及与科学研究有重要关系的几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和通过《关于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

对于科学研究工作体制中，要不要成立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关于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写道：“在八月份的讨论中，少数同志曾有不同意见，但出席会议的中国科学家（包括郭沫若院长）和大多数有关单位负责干部，一致主张建立一个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因为科学规划是全国规模的，而执行时必须分为三个系统，即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另外还有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对这几个系统实施科学规划的情况，应该有一个机构经常加以监督。同时怎样使这几个系统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协调地执行规划，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各方面不协调，会产生有些任务落空，有些任务重复等现象，妨碍科学的发展。至于由什么机构来负责这一任务，大家曾考虑过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或国家经济委员会，或国家技术委员会，或科学院来担负这一任务，但都觉得不适当。国家计划委员会只能最后综合平衡科学研究的长期计划，不能负责年度计划和协调等繁重任务；国家经济委员会只能最后综合平衡科学研究年度计划，不能管长期计划，也很难处理科学研究的许多协调工作；国家技术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技术政策和技术改革等，由它把科学院、高等学校、原子能和平利用委员会和

^① 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192，196．

航空工业委员会的科学研究工作全部管起来也不恰当；科学院也不宜担负过多的科学计划行政任务，特别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

《关于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还写道：“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全国科学家很重视‘科学规划委员会’，以参加科学规划工作为无上光荣，它是我们最近新发现的团结全国科学家的一种良好的组织形式。科学家们喜欢这一个组织形式，我们就不应当轻率地抛弃它。因此，把科学规划委员会保留下来，并设一个精干办公机构担负上述任务，是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主要是认为有了这样一个机构，反而不好工作。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在十月二十八日的会议中，大家一致同意了大多数人所赞成的意见。”

《关于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建议：这一高级协调机构“应该及早工作起来。”“关于高级协调的组织，建议：保留现在的科学规划委员会。”^①

1956年11月30日，中央批准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报告。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保留，成为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

（四）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继续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并存（1956年12月~1958年11月）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后，为了加强领导，对委员会人员组成了调整。1957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郭沫若、林枫、李四光、黄敬、杨秀峰为副主任，丁颖等106人为委员，他们大部分是科学家，范长江为秘书长，武衡、李强、安东、姜君辰等为副秘书长。

关于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任务，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在1956年10月29日《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出过五点建议。1957年5月12日，国务院第48次全体会议确定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是掌管全国科学事业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领导机关。它的任务是：负责监督“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实施，特别是重点任务的实施；负责汇总平衡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成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负责各系统间重要的协调工作；管理国家重点研究任务的科学基金；负责制订和实施高级专家的安排、培养、分配、使用的计划；负责研究和解决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问题（如图书资料、情报、仪器、化学试剂等）；统一安排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②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组织实施“十二年科学规划”的任务时，凡是与工业、交通有关的科学技术工作，全部交给国家技术委员会安排，由国家技术委

① 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428-434.

②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当代中国的科学事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21，22.